

# 全球对话

## GLOBAL DIALOGUE

2.4

### 中国社会学何处去？

孙立平

### 社会学与明星

Robert Van Krieken  
Vedat Milor

### 拉美的暴力与抗争

Johanna Parra  
Nadia Rodríguez  
Milton Vidal

- > Beirut 2012年执行委员会会议
- > Johannesburg 2011年社会学实验室
- > 社会学旅程
- > 阿拉伯抗争
- > 社会学是单数或复数？
- > 编辑介绍：伊朗团队
- > 法语社会学
- > 历史一隅：更多关于AISLF的历史
- > 印度社会学的挑战
- > Ankara大学的公共社会学
- > 民主化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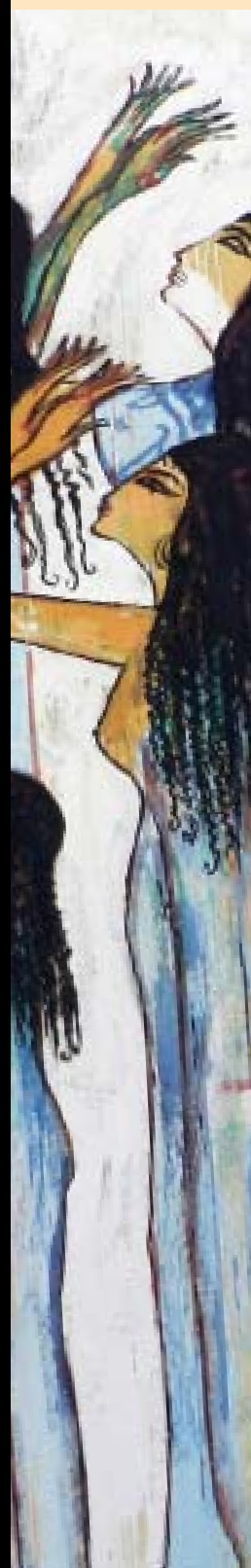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四期 / 2012.5

GDN



# > 主编的话

## 在线ISA—社会学的未来

**全**球对话已经出版2年了。我们从8页增加到30页，从最基本的页面演变成特殊的版面设计，也从通讯变成了一份杂志。它以电子化的形式出版，但是我的包包里还是装着几种语言的纸本。它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社会学视野，也是ISA的大小事，如会议、辩论、特集、各国社会学信息的汇整专辑。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编辑团队之间它开启了一个对话的空间。例如，这期就有来自波兰Warsaw的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对于上一期全球对话中，关于社会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讨论的报告。总之我们拥有了一个年轻社会学家的网络，开创了世界社会学的多元性。

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串起了这个全球的连结：Public Sociology, Live! 我们有一群杰出的社会学家，深深镶嵌在每个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国家里，然后跟Berkeley的大学生讨论社会学的人生旅程。透过Skype，这些学者不必出远门接受访谈，而所有的记录倒可以在ISA的网站上看到(<http://www.isa-sociology.org/public-sociology-live/>)。在Barcelona, Tehran, Johannesburg, Sao Paulo, Kyiv, 和Oslo的师生都可以看到，并且讨论和张贴自己的意见在[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ublicsociologylive/)，藉此深化辩论。我们因此等于是建立了网络的论坛，实验室，以及学院，让大家透过沟通讨论一起实践全球社会学。

社会媒体可以强化或是深化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即使是面对全球的观众也是如此。因此，一系列由Laleh Behbehani负责的“社会学旅程”([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http://www.journeys-through-sociology.org/))访谈了世界各地的ISA执委，让我们认识到他们接触社会学的契机与所面临的挑战。多数的ISA之前未必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人，但是现在只需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下载，模仿，改善这个方式。网络或许会让教育质量低落，但也可以增进教育质量。网络可能降低沟通效果，但也可以深化彼此的对话。只要我们控制了网络，我们就可以决定怎么去使用。

全球对话每年发行5期，以14种语言刊出。读者可以在[ISA website](http://www.isa-sociology.org/)阅读全文。投稿请寄给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mailto:burawoy@berkeley.edu)



中国社会学何处去？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孙立平接受访谈谈到了中国社会学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趋缓停滞。



论学术明星化—Robert Van Krieken讨论名人现象已经进入学术界，建立了类似好莱坞的明星体系，于是赢者全拿，学术作品沦为在市场上竞价的商品。



从社会学教授到美食专家—各位，你想转行吗？土耳其的社会学家Vedat Milor将告诉我们他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电视人物。他现在是黄金时段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d Shahvand,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Nastaran Mahmoudzadeh, Najmeh Taheri, Tara Asgari Laleh, Milad Rostami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姬野宏輔, 高見具広, 岩館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Yu Fukuda,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資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ł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ć,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俄国: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Mustafa Aykut Attar.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在线ISA—社会学的未来 2

中国社会学何处去? 4

访谈孙立平, 中国 4

## > 名人

### 学术明星化

by Robert Van Krieken, 澳洲 6

### 从社会学教授到美食专家

by Vedat Milor, 土耳其 8

## > 拉美的暴力与抗争

### 绿宝石暴力

by Johanna Parra, 哥伦比亚 11

### 哥伦比亚的土地偿还

by Nadia Rodríguez, 哥伦比亚 13

### 智利的学生运动

by Milton Vidal, 哥伦比亚 15

## > ISA动态

### 2012年执行委员会会议

by Michael Burawoy, 美国 17

### 2011年社会学实验室

by Tina Uys, 南非 20

### 社会学旅程

by Laleh Behbehani, 美国 21

## > 会议

### 阿拉伯抗争

by Amina Arabi and Julian J ü rgenmeyer, 黎巴嫩 23

### 社会学是单数或复数? 波兰观点

by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波兰 25

## > 特辑

### 编辑介绍: 伊朗团队

by Reyhaneh Javadi, 伊朗 27

### 法语社会学

by André Petitat, 瑞士 28

### 历史一隅: 更多关于AISLF的历史

by Jennifer Platt, 英国 30

## > 地方

### 印度社会学的挑战

by Ishwar Modi, 印度 31

### Ankara大学的公共社会学

by Gü n n u r Ertong and Yonca Odabaş, 土耳其 32

### 民主化未来

by Markus S. Schulz, 美国 33



# > 中国社会学将往何处去？

## 访谈孙立平

此访谈由Michael Burawoy（以下简称布）在沈原、胡丽娜、陈秀英等人的协助下所进行完成。孙立平（以下简称孙）是当今中国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北京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著名中国社会学家，正在解释何谓转型困境。

布：近来你对中国发展的停滞多所著墨，并提出了“转型困境”（transition trap）的说法。请问你所谓的转型困境的内涵为何？

孙：转型困境指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结构阻止了进一步的改革。那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会想要维持现状、制度特征，并且建立“混合制度”以进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状况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扭曲，并衍生出许多相关的问题。相较于苏联和东欧，中国的转型是属于循序渐进模式，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此种改革的短暂成功为日后的改革进程设下了重重阻碍。

布：能不能请你再多解释一点？

孙：中国经济的成功导因于政府对所有资源的独占和管理。这样特别的发展模式其实是建立在贪腐的官僚和政府的寻租制度之上的。随着这个掌握大权的官僚体系的扩张，通往真正的市场经济或法治的道路也因此受阻。

布：你是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对你意义为何？你怎么把社会学知识传播给公众？而这样的公共社会学又怎么影响了你？

孙：我想说明一下传统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差别所在。传统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生产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透过这种方式，社会知识可以透过间接的方式影响社会，而且多数是非预期的后果；相较之下，虽然公共社会学也生产知识，不过其主要目标是在于对社会产生影

>>

响。若用Robert Merton的话来说，传统社会学显性功能生产知识，而隐性功能是影响社会；而公共社会学则正好相反。

在研究主题和建立理论的方法上，上述两者也有所差别。在中国，我们选择的研究主题都是优先考虑那些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矛盾与冲突、改革困境等等。所以我们社会学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影响大众对社会议题的了解，并且影响政府的决策。

影响的管道主要有三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影响这个学科的走向；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包括社会媒体，如Twitter)以影响大众；撰写研究报告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订。然而，我们并不会直接介入社会行动之中。

布：你怎么看待社会学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孙：因为中国是一个历经巨大变迁的转型社会，所以社会学对于大众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今中国的社会学既可影响大众认知，也可以影响政府政策。像是由社会学者提出的乡镇企业(VTEs)的工业化模型，以及结合乡村和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成为了政府的地方政策。此外，特别是在工作单位制度废除之后，由学者提出的“小区”的理论概念也成为了官方文件的主要用语。

布：什么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前困境？有什么议题是你们不能谈论的吗？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去回避敏感的议题呢？作为国家的批评者，你怎么保护自己？

孙：在中国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谈的，但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现在的言论空间之大，可能远远超出你所能想象。许多公共议题都可以直接谈论了。事实上一些敏感的问题在经过技巧性的修饰之后也可以碰触，像是可以藉由谈论历史来论及当今的现实问题，或是藉由讨论苏联或东欧来评论中国的议题。拜网络所赐，如Internet, blogs, twitter，加上由于言论管制宽松许多，敏感议题已经被广为谈论了。我应该再加上社会学的客观性、对数据的强调等的科学性质，去帮助拓展这个言论空间，使其更加开放。

布：你是怎么开始接触社会学的？据我所知，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作农民的口述历史，你从这样的研究中学到了些什么呢？

孙：我本来是学媒体传播的，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改读社会学。那时正逢社会学在被禁止了30年之后刚刚开始重建的时期。在1980年

代我的兴趣是现代化，因为那是中国社会当时最核心的问题。我的口述历史研究从1996开始，目的是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共产主义实作。我们企图从文明化转型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市场改革。这样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被组织起来，并镶嵌在日常生活实作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到乡村去访谈农民在革命时期的经验的原因。

布：你怎么看过去这30年的中国社会学？又怎么看待未来的前景呢？

孙：美国的学术界关心的是知识的累积，欧洲关心的是价值，而中国关注的则是现实问题。易言之，中国学术界向来有着关照现实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学界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已经日渐减少了，社会学似乎变成了研究自己的一门学问，而非研究社会。即使是研究社会，其所生产的知识也是片断的。

我始终认为研究社会转型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透过检视这个过程和事件。即使我们关心社会学本身的发展，但上述我所说的任务还是很重要。社会学的开宗祖师都共同关心资本主义文明化；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地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文明化过程。其拥有和西方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制度、价值、和逻辑，并且在近来来正历史性的转变。我相信对于共产主义文明化之特色、逻辑、过程的研究，会成为社会学新或是更广义社会科学的启发和动机来源所在。■

# > 论学术的明星化

by Robert van Krieken,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ISA财务与会员副会长



| Pierre Bourdieu：反对明星化的学术明星

今天的大学已经分化成三个阶级，而且界线愈益分明：

- 菁英阶级。他们专注于研究，只需要负担很少或者甚至不用负担教学与行政的责任。
-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需要同时教学与研究，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需求和教学质量的要求。研究质量是以菁英阶级的标准为主，所以中产阶级注定失败，或是得努力地跻身菁英阶级。
- 无产阶级。他们通常只有暂时性的教职或研究身份，期待有朝一日成为正式教授或拿到终身职。

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在这里我想从“名人理性”(celebrity rationality)的角度切入去阐述我的想法。在支撑社会名流阶级一演员、电

视角色、运动明星一的社会经济机制和大学的转型之间，我认为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我的研究计划已经开始去分析名人和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不平等、认同、权力、治理等)之间的关系，而学者是明星社会中典型的例子。

在Robert Michels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已经讨论过这个议题了。不过，我认为C. Wright Mills的贡献最大。他论及了社会透过某种独特的竞争方式去生产出一批名人阶级，亦即把特定的一部份人视为名人权贵。这些人是具有高度可见性的“表演者”，并且是其他竞争场域在认知和实践上的参照点。在Power Elite (Oxford, 1957: 74)一书中，Mills说：

在美国，这个体系让某些个人拥有让小白球可以连续进洞的本领，最终目的就是坐上总统宝座。这个体系也让让广播或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或演员可以有机会成为公司执行长、政府阁员、以及高阶军事人员。这和一个人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只和一个人可不可以从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有关。一旦取得胜利，他就成为明星了。

这样的描述不全然精确。虽然摇滚明星可以选总统，但是会打小白球的人还是略胜一筹。重点在于可见性和可辨识性的传播本身变成了一种资源和价值，并且独立于其当初的生产过程。

Robert Merton将这样的问题视为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从马太福音25:29中而来：“因为凡有的，还要加

>>

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他说，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会比他的同事获得更多的注目眼光，而和研究的价值没有关系。受到瞩目这件事可以为学术人员财富，而所带来的财富是自我累积式的，而且只要待在学术圈，就会一直累积下去。Herbert Simon在1971年时也曾提及这个观点。他指出，当信息和知识的生产有所剩余的时候，稀有资源就会变成大众的焦点事物。受到关注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引导大众的认知方向。关注，是一种“位置财” (positional good)，如Richard Sennett在讨论音乐时所说的“星状系统” (star system)，某些音乐家可以超越仅仅成为一个杰出音乐家的层次，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进而成名，然后排挤掉其他杰出的音乐家。

当全球的大学愈来愈计较排名，并且大学评比标准越来越琐碎化的时候，在大学之间、教授之间、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类似前述所言的竞争体系，进而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名人——明星教授和明星大学。或许文献引用可以用来评断研究的质量，但是，这也可以用来作为衡量该篇文章作者的明星程度。我们引用Bourdieu或其他人并不只是因为这代表了我们的某种独特性，还表示了我们知道Bourdieu这个人。

这样的学术名望系统在三个层次上运作：个人(通常是研究者，而非教师)、大学(大学)、国家或区域(国家或是国家组织)。或许我们的比喻有点走得太远了，不过在很多方面而言，他们的确都渴望、或是被迫渴望成为某个学科或是全球学术体系中的Kim Kardashian。就如同Kardashian的能见度会影响到其形象与品牌的支持和销售，大学排名也会影响到招生、社会地位、以及募款。这也是为什么大学都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在建立自己的品牌上。

我们可以从大学声望和大学转型之间

的关联性分析中得到什么启示？这边我们没有办法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可以试着举出几种讨论的可能性。第一，若我们能够辨识到这整个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关注的生产与分配的体系，而关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并且无关乎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更质疑与批判的角度去看待大学正在玩的这个场争夺地位的游戏。了解到这个菁英体制其实就是一个名人体制，那么大学的危机就是一场争夺关注焦点的斗争。

第二，若我们在玩的就是一场争当明星的游戏，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其他更广义的名人游戏，应用相似的策略到学术场域中。我们都知道Andy Warhol说过：未来每个人都会成名15分钟。而后来他改口：每个人在15分钟内都可以成名。我们将可以在其他更多的场域发现这项机制。

相较于接受学术地位的阶层体系(类似好莱坞的明星地位)，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去由下而上发展出自己的学术评比标准，不是去追求明星光环，而是去区辨什么是好的和有用的学术研究。打破赢者全拿的游戏规则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只要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只把眼光投注在学术明星这件事情上面。 ■

# > 成为名人

## 从社会学教授到 美食专家

by Vedat Milor, Istanbul, Turkey



美食专家Vedat Milor：这东西吃起来似乎并不怎么样。

8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幅景象：电视里面的那个人参加一场灵修的聚会，正在虔诚祈祷着。他用手撑着头，眼睛注视着某一个地方。忽然间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掉进了海里，引起了一阵骚动。然后镜头就转到了一个高瘦男子的身上，门牙少了两颗，穿着烹

饪围裙。比较奇怪的是我们的电视主角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不幸的事，反而走向厨师，问说：“为什么你这道菜加了苹果醋却不用白酒醋？”

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会忍不住笑个不停呢！我其实是用一种消遣和难以置信的眼光在审视着自己。这可不是什么电视实境

秀喔，而是土耳其NTV的周末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而我就是电视里面的那个人。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吃遍各个餐厅，品尝佳肴美食，判断好不好吃，说说自己的批评，并听听主厨们怎么向我解释。若餐厅里有很多种酒，我就会让他们每种倒一杯给我试喝，看看够不够水平

>>

。

有两位摄影师和一位制作人和我一起逛餐厅。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在土耳其，不过偶尔也会到罗马、加泰龙尼亚、乔治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地。每次拜访完一间餐厅，我会做出两到三分的评论，然后给星星评等，从一星到五星级。只要是被我评为四星或五星的餐厅，即使那个餐厅之前门可罗雀，最后都会吸引一票顾客上门然后大赚一笔。

你们一定认为我是个大厨师。别闹了，我连打蛋都不会呢！但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明星，因为走在路上总是会有路人来要跟我索取签名照。大家也在网络上热烈讨论我这个人，我的个性、动机，且很好奇我的私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很多大学生一直寄信来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和我一样有名。更有许多中学生的家长要我出书，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小孩教成和我一样。在他们眼中，我是“偶像”，他们的孩子日后都想成为另一个“Vedat Milor”！

好，那到底我是谁？这整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30年前，这个人从Bosphorus University经济系毕业，然后到美国的Berkeley社会系念博士。大学的时候着迷于斯拉法、新凯恩斯学派、阿图赛、以及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

义；但到了Berkeley，他开始喜欢上民族志，从事深度个案研究去了解社会变迁。他的指导教授Michael Burawoy告诉他比较方法才可以发展出一个解释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架构，例如土耳其。所以最后他比较了土耳其和战后法国的经济，企图说明核心和边陲国家的结构差异与国家自主性。

在这里我想要为我的“无辜”解释一下：喜欢法国红酒是我选择法国作为论文个案的“非预期后果”。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从在1982年我花了10元在Berkeley的Kermit Lynch Wine Merchant买了1982年的Henri Jayer Bourgogne之后，我就爱上了勃艮地红酒了。我那时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但是却喝很好的红酒。好的红酒有着多层次的香气，多变的特质可以挑动与刺激我的味蕾。她的质地很柔很精致，吞咽入口后却又有另一番令人惊讶的强韧与辛辣。如此地复杂与迷人，完全体现了布尔乔亚民主和西方文明化所令我着迷之处，截然不同于单调乏味的美国Reagan政府和土耳其的Kenan Evren的军事体制。

“但是为什么你要比较土耳其和法国？”一位Fulbright奖学金的审查人这样问我。我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她在听过我的答案之后的那张惊讶的脸。

我回答：“因为美酒和美食。”当我拿到奖学金之后，我猜想她必定是同意我的吧。我说的可都是真的。Malcolm Gladwell在他非常有名的著作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的“1万小时理论”中说：有些人是天才，但是绝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是工作狂，至少花上了1万小时才得以精通了某项才能。所以，我也可以有一个“1万瓶红酒理论”，可不是吗？我很可以肯定在1985和1990年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餐加了很多俱乐部和聚会，所喝过的红酒，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毕业之后的时间就过得非常快了。我后来到世界银行当政治经济学家，但是当我的论文得到美国社会学会的最佳论文奖时，我又回到了学术圈，在Brown University和Georgia Tech教书，后来又在Stanford拿到了一个法学学位，并被选为杰出法律学人(Order of the Coif)。我也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问过一年，有幸可以亲近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Albert Hirschman；我也在硅谷的一间新公司工作。

但是当在硅谷工作过之后，我从此就对学术就失去了热诚。在Georgia Tech公共政策系的计划“如何利用Georgia交通部的

外部咨询顾问去提升效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发现我一点也不想成为技术官僚，对我同事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想要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我在世界银行的一个朋友后来当了土耳其非常有名的报纸Milliyet的主编，他当时正在找一个懂酒和食物、且有公信力的人。于是他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写个每周专栏。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开始像是坐上了云霄飞车一样，充满惊奇。

我出名了的这件事可以有个理论性的解释吗？我想有。让我出名的原因就和是得以让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在2002年执政一样。之前的执政党是世俗的军事官僚菁英和一群布尔乔亚阶级的联盟，后来失去了对政治经济控制。再加上政治的贪污与经济危机，AKP的伊斯兰民粹主义诉求公平和透明，在执政党的分裂中占到了优势，并从独占的资本家中找到了

支持者。AKP也动员了边缘的安那托利亚的布尔乔亚，都市商人、建筑商、保守受过教育的年轻族群、以及摇摆不定的都市穷人。

我其实很惊讶我的节目可以在安托利亚人和都市穷人中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当然可以买得起红酒和美食，但那些都市里的穷人和年轻人有怎么说呢？我其实受惠于我是个外来者的身份。我不是食品产业里面的老面孔，也和餐厅与食品工业之间扯不上半点关系。

不过我想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得以使得我在年轻人之中也受到广大的欢迎。在AKP执政之后，伊斯兰的禁欲主义和压抑的文化开始抬头，再加上政府对于社会抗争的镇压，使得年轻人只好把精力专注在想象力和娱乐文化上，从中得到解放。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和对社会的压制一方面带来了恐惧，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想象力。年轻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并且要懂得欺骗

才得以成功。所以，他们父执辈可以轻松品尝佳肴美酒的文化变成了他们想象上可欲的另一个自我认同。相较于困苦的生命和受限的理想，人生若是可以尽情探索“味道”这件事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或许我就是他们眼中的Jayer Bourgogne，让他们得以在非常恶劣的文化与经济环境中强化精神上的能量，解放受到压抑的感官。这种“奇怪的理想主义”是名人文化和名人作为偶像的反面。就像马克思说的：“名人文化的死亡必须先是有名人的解放。”

# > 绿宝石暴力

by Johanna Parra, Universidad Icesi, Cali, 哥伦比亚



没有过家比哥伦比亚还有拥有更多的祖母绿。争夺资源的家族让矿业变得充满暴力。图为一个工人在计算自己的宝石数目。Jan Sochor 摄影。

在哥伦比亚，派系暴力已经成为了社会学的分析主题了，而且渐渐有演变成“暴力学”的趋势。哥伦比亚社会学一开始是研究历史上的La Violencia (1945-1965)时期，以一本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La Violencia en Colombia. Estudio de un Proceso Social (1962)为基础，其作者是Bishop Germán Guzmán Campos, Orlando Fals Borda, Eduardo Umaña。这部著作以社会学的角度和结构贫穷为核心概念去解释什么原因导

致了社会暴力。1948年4月9日发生的Jorge Eliécer Gaitán (Liberal Party的元首)的暗杀事件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起事件。这起事件把社会与政治的暴力想象彻底实现，但是“社会实体”分裂的真实原因是象征上民族国家的缺席。

许多政治、军事、宗教的组织动员人民拿起武器、以生命为代价去反对其政治上的对手。哥伦比亚的主要政党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他们都是从独立运动(1810-1830)而来的。从那时起，暴力也就镶嵌

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在1863-1886年间发生了9次内战，成为了派系暴力和对抗的历史根源，一代传一代。此一观点在Daniel Pécaut的Order and Violence一书中有清楚的说明。

暴力学把研究范围延伸到各个时空，是哥伦比亚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也是了解哥伦比亚社会与历史的起点。不过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们还是得建立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才能够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我的研究就是朝这个方向进行的

>>

。

La Violencia时期导致的不只是军事战争、流血与死亡，还把野蛮文化带入了日常之中。La Violencia时代的尾声，也是1960和1970年之间的冷战时期，许多组织组成武装马克思游击队。其中的哥伦比亚革命军(FARC)来自自由党的武装分支，至今仍相当活跃。其他的武装组织则是来自于保守党和毒枭。无止无尽的暴力冲突造成了系统性的恐怖与残酷，让许多人流离失所。暴力深深地镶嵌在日常生活中，侵入了亲密关系领域，造成极大的痛楚，且一代传给一代。

让我说明一下我对绿宝石地区的相关研究。这是一个在东安地斯山脉的地区，人口8万人，距离Chiquinquirá (是Department of Boyacá的地方首都)有40公里。近10年来，这个区域的经济从农业转变为矿业。这位一小部分投资矿业的人带来的巨

大的财富。巨大的转变造成了家族的分裂和产生了新的结盟。这些积极挖祖母绿的家族所组成新的新结盟需要企业家和警卫的合作。这也巩固了原本农业中的黑手党家族，使得流血、荣誉、忠诚等文化得以延续。这和Anton Blok 的书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A Study of Violent Peasant Entrepreneurs (1860-1960)所描述的类型。

因为哥伦比亚政府无法管制这些暴力采矿的情形，1970年这些矿产掌控在黑道老板的手中，地方上都称他们叫做Dons。1960-90之间的战争就叫做绿宝石战争，是黑道们争夺矿产地盘的战争。五千多人丧生。1991年，战争生还下来的Dons签订了和平协议，可是暴力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因为毒枭的军队出现了。新势力的出现让地方的家族必须再次面对这些武装冲突，更进一步加深了暴力文

化。

哥伦比亚其他的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暴力进入到了最私人的领域，进入了家庭，进入了教养之中。这些都导因于经济快速成长和国家的无能管制。虽然在道德和政治上很令人失望，不过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学得以进入分析和国家得以介入管制的地方。 ■

# > 哥伦比亚的 土地偿还

by Nadia Margarita Rodríguez, University of Rosario, Bogotá, 哥伦比亚



就像图中的这位老人。在哥伦比亚，有400万名农人被迫在过去15年放弃自己的土地。Julián Vasques摄影。

**哥**伦比亚土地偿还的争议肇因于1448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也被称为受害者法，在2011年6月10日通过。这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国家承认了武装冲突的事实。特别的是在法案第三章决议偿还土地给过去20年那些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农民。这是50年来哥伦比亚暴力冲突的缩

影。此法案之所以争议就在于政府的支持角色事实上等于说明了过去政府的消极作为。不过，虽然大家都很努力，不过要实施这项法律还是困难重重。

土地偿还议题必须要从哥伦比亚的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化的脉络来理解，这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学者认为

>>

这不只是造成严重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原因，还是严重暴力冲突的罪魁祸首 (Fajardo 2002, Machado 2009, PNUD 2011)。土地集中化导致了两极化的农业结构，一小部分菁英掌控了大部分的土地。<sup>1</sup>这在殖民时代便是如此，如今情况只是更加恶化罢了。在1936-1961间的农业改革失败后 (Molina, 2000: 36)，武装组织在1960年代出现后开始要求归还土地。因此，大部分的哥伦比亚乡村被这些武装部队所控制，造成了系统性的暴力和近400万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所以，土地偿还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对象实在太过于庞大了。

因为法律限制和相关的社会脉络，所以情况相当复杂。University of Rosario的发展研究中心采用跨学科的方式(结合法律和社会科学)企图去理解法律实行的挑战。其中一部份的研究是由土地偿还部门所委托。<sup>2</sup>这项研究的挑战有以下5个：

- 第一，在土地偿还地区里，武装暴力还是持续不断发生，所以没有办法保证农民不会再失去土地。最大的挑战就是保护这些农民免于武装暴力的袭扰。

- 第二，法律主要定义土地偿还为给予头衔和补偿，不是补偿任何人和土地的伤害与损失，也不能恢复之前的状况。法律不能被限定再只给予土地，而

必须确保人们能有尊严的在那生活。况且这些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心灵的创伤，包括许多违反人权的事件。这让他们更难返回土地生活。所以这些人需要的不只是法律，还要其他更多的资源去支持。

- 第三，那些失去土地、现在住在城市里的农民未必愿意回去，因为农村拥有的教育、健康、发展等的资源极为缺乏。而且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这让他们更难重建家园。

- 第四，若地主要生活下去，经济、科技、生产的资源是必须的。而不是用租的或卖给大公司。

- 第五，我们还有法律和制度面的挑战要面对，包括了训练公职人员去执行偿还政策，或是农业法官的训练(在哥伦比亚尚未存在)。国家要证明侵占土地的情形确实发生过。由此一来就产生另一个问题：国家要怎么从现有的地主中拿回土地？而且那些买主是经由法律所允许的。

最后，在国家和地方菁英之间的冲突也是另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冲突围绕在土地上或土地下的资源争夺。一些著名的例子，例如 Curbaradó、Jiguamindó或是Hacienda Las Pavas，证明了即使法律争议解决了，地方上的权力菁英还是会想尽办法阻止土地归还政策的实行。

## 批注：

1. 土地基尼系数可以测量土地的集中化程度。越接近1代表土地越集中。哥伦比亚是0.87，是全世界土地最集中化的国家。

2. 这是为了要实施此一法律所设置的政府单位。前身是Program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nd and Dispossessed People (PPTP)，但这不如现在的这个部门拥有政治与法律的支持，目的也不一样。 ■

## References

- Fajardo, D. (2002) Para sembrar la paz hay que aflojar la tierra. Bogotá: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 Machado, A. (2009) La reforma rural, una deuda social y política. Bogotá: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CID.
- Molina, P. (2000) "Reforma agraria? No es tan claro para qué el país la necesita." *Economía Colombiana* 278: 34-7.
- PNUD (2011) Colombia Rural: Razones para la esperanza. Informe de desarrollo humano 2011. Bogotá: INDH PNUD.

# > 智利的学生运动

by Milton L. Vidal, Academic University of Christian Humanism, Santiago, 智利



15

智利学生运动。口号是“不要出卖我们的未来！”

**智**利是南方小国。由传统的制图学视角，你可以在南美洲的末端找到我们。你也可以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上常常看到智利。2011年，智利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成的学生运动引起了各界广泛的注意。

我们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三分之一的贫穷人口，并且遭受到暴力、虐待、贪污、搜刮稀有资源等的

伤害。在这个脉络的其他国家里面，通常男人、女人和小孩会一起集结起来要捍卫自己的理想，要求保障基本人权，要求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做出符合大众利益的决策。所以智利人民也不例外。有许多原因造成智利人民的不满而走上街头，有些甚至比学生的社会权益等议题来得更加明显。我们不能忘了：智利是从1970年开始南美洲第一个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其中特别是大学教育的部分。

为什么智利学生要走上街头？为什么其他国家都觉得智利的学生运动非常具有正当性呢？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承诺跳票了。的确，确保所有人的大学受教权这项承诺反而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大学生的增加同时让更多的家庭负债累累。智利是学费出了名的贵的国家。所以学费大多由贷款支付。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sup>1</sup>这点特别重要，因为高等教育是公共财，而且是社会

>>

流动的关键所在。

在智利，家庭对于昂贵教育的投资可换取很好的报酬，而且学费还在持续升高当中。所以有人就是去买权力。总之相对昂贵的教育投资(小学和中学)可以进入好的大学(以成绩或是靠关系)，可是那些负担不起这些投资的人就会受到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求好的教育是一种反对社会不平等的诉求。

很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捍卫高等教育受教权的运动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他们的要求和主张，以及参与的社会群众，其实并不只是智利的现象。相反的，捍卫公共教育的运动在乌拉圭、玻利维亚、巴西、波多黎各、厄瓜多、哥伦比亚等地也很成功。不过，智利的例子还是很值得国际上的关注和讨论。

第一，大学仍然是社会的晴雨表。不断强调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太简单了，不过这么简单的事情却常常被人所遗忘。政客该改革高等教育，可是却一拖再拖，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这是核心议题。而经济领袖们则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可以透过公部门、银行、家庭等挹注资源得到改善。错！大错特错！大学议题远远超出政策的范围。所有的社会变迁都和大学息息相关。当我们思考关于犹太人从古巴比伦王统治的波斯帝国中出走，柏拉图的学院之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在University of Geneva的卡尔文教派，什叶派统治前后的伊朗，共产革命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或是天安门广场，墨西哥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等等议题，我们会发现大学一始终都是社会的重要制度。所以，教育必须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第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绝对不行被两极化的市场和力量所决定。Humboldt以前认为国家总是干涉教育，这点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都知道国家总是体现其权力于官僚系统中。教育社会学家也清楚了解到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执行国家政策。然而，即使是Humboldt也认为教育改革不可能没有国家。我们还是要要求国家确保教育的制度稳定，也需要国家去杜绝让大学沦为个人利益的竞技场。从这点而言，教育是公共财，大学是公共制度，不论大学是私立或是公立皆然。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外部功能绝对是公共的。大学得以授与文凭也是建立在社会对他们的信任之上。

第三，智利的学生运动，或是更广义的在拉美，都拒绝教育的商品化。市场的组织逻辑和科学训练的逻辑是不兼容的。让我们看看教授和学生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就知道。教育是一种集体努力，不可能被当成商品拿去贩卖。学生唯有透过参与科学活动才可能学到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鼓励学生参加讨论，去写报告，去参加研究小组，去分享、辩论自己的观点。把教授和学生视为销售者和顾客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而且必须用非意识形态的理由去反驳这种想法)，更是教育的绊脚石。我觉得可怕的是我学术圈的同事确有人也接受这种把学生当成消费者的想法。学生需要学术自由，并且学术自由取决于教授的自主性。可是今日这种自由已经被市场经济所侵蚀了。若是教授被当成是服务的提供者，那么教授就只不过是校方的雇员而已，如此一来，教授沦为只是在帮助老板赚钱的手下。

最后，我必须说，学生运动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大

学让社会可以把自己转换成研究主题，并在这过程中再次强调自身的重要性。利益和权力的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并有可能威胁到学术自由。可是，这些斗争不足以摧毁大学。这样的观点也是我们应该用来观察智利学生运动视角，也可应用到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我认为学运对民主社会是有益的，社会和大学在这个意义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未社会学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脉络。有些人认为社会学越来越不重要，那可错了。社会学在全球南方仍然强韧有活力，我希望这点可以激励各位读者们！ ■

#### 批注：

1. 智利是新兴的OECD国。该组织的报告指出智利的基尼系数是0.5，这是这些国家之中最不平等的(Society at a Glance, Social Indicators, OECD, 2011)。若我们更进一步阐释此一现象，就是智利最富有的前10%是高过于挪威的，可是最贫穷的10%和科特迪瓦差不多。60%的智利人的平均收入低于安哥拉。

# > ISA执行委员会议

March 19-23, 2012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A



执行委员会议中的餐点。Markus Schulz摄影。

ISA为期五天的年度执行委员会议在University of Beirut (AUB)，由Sari Hanafi与其在社会系、人类系、以及媒体研究的同事慷慨负责主办。其中两天我们同时举行了一场“阿拉伯革命”的研讨会(在本期有相

关文章)。这个研讨会由AUB、黎巴嫩社会学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基金会协办，并邀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一起从比较的视野探讨这个议题。

五天的会议分别同时进行不同的场次，包括了横

滨世界大会的计划筹备会议，由副会长Raquel Sosa主持；出版委员会会议，由副会长Jennifer Platt主持；财政和会员委员会会议，由副会长Robert Van Krieken主持；研究协调委员会议，由副会长Margaret Abraham主持；

>>

最后是国家委员会会议，由副会长Tina Uys负责。

在会议当周的最后一天进行为期2天的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我跟大家报告了我到各个国家的心得以及在线ISA计划的进度(请见主编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2018年的世界大会要在哪里举办。目前有5个很棒的申请案，分别是Budapest, Copenhagen, Melbourne, Zaragoza, 和Toronto。我们最后决定2个决选名单：Toronto和Zaragoza。在拜访前者之后就可以做出决定。另外我们决议接受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成为会员。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为基础，我们开始思考是否要成立ISA奖，颁发给杰出的社会学研究。以下则是各位副会长的报告。

## > Margaret Abraham, 研究副会长

研究协调委员会(RCC)这次的Beirut之行收获颇丰。我们讨论了下列议题：研究委员会章程的修订，主题和工作小组，所有RC、TG、WG的活动(2006-2010)，以及在2012年8月于Buenos Aires举行的论坛。

会议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论坛的筹备事宜。目前我们收到了6,019份摘要，来自7,928位作者，共有693场次(51场为西班牙文)。世界各地的申请者

中，拉丁美洲为最大宗(3,528人，45%)。

虽然我们希望越多人越好，可是经济的考虑下，人数势必得缩减。我们正在和Sage讨论是否可以设立一个虚空间，让知识可以传播和教，以及分享与这次主题“社会正义与民主化”的相关研究。更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很快就会告诉大家！

关于RC/TG/WG规章的修订，我们决定还是要由RC/WG/TG提供他们修订后的组织章程。同时我们也考虑要求各个RC/WG/TG的委员会，利用特别的办公时间去审查他们自己的组织。很多委员会必需要自己找出下一任的负责人。

RCC也审查研究奖金。总额\$16,900美金的奖金于2011年分配到了18个RC/WG/TG中，€8,660欧元将会于今年颁给13个RC/WG/TG委员会。出版副会长Jennifer Platt搜集了各个委员会的简介放到了网站上：[http://www.isa-sociology.org/about/rc\\_aims.htm](http://www.isa-sociology.org/about/rc_aims.htm)。

最后，我们对2006-2008和2008-2010的RC/WG/TG做出了回顾和检讨。多数的委员会都很积极筹办会议和出版通讯，以及其他许多专业的活动。新版的RC/TG/WG活动申请表变得更有效率。

## >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会长

Sujata Patel是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SIS)的主编，Sage出版社将在印度出版这个刊物，ISA的会员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可以用印度的售价购买，不过这些精装书籍也都会以西方的价格出现在西方的图书馆。我们也达成共识让国家学会可以翻译印行(自行负责)任何Current Sociology (CS)或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文章，且不用付版税。CS每年会发行特刊，将报括Sociopedia上的文章。

另一项政策是期刊主编和出版副会长要在每一次ISA会议中负责提供出版的相关活动，例如像是面对编辑，期刊写作工作坊，面对地方编辑等等。每年他们也要出席重要的会议，观察重要的发展，招徕新的作者、审查者等。

## > Raquel Sosa, 计划副会

我很高兴告诉大家一件事：这次在Beirut召开的横滨大会的计划筹备会议非常成功。大会主题是“面对不平等的世界：社会学的挑战”。我们已经展开征稿，截止日期是2013年1月25日。相关信息可以在ISA的网站上找到：<http://www.isa-sociology.org/congress2014/>。我们也很欢迎各位申请特别场次或是整合场次，以及作者面对批评者。我们希望各位将这次大会视为

>>

是一次参加国际级知识交流的难得机会。如同许多的ISA会员专长在贫穷、不平等、不正义等领域的研究，同样地，希望在横滨大会上看见大家对知识和实践都有所贡献。

计划委员会也同意筹备10个半全体出席的场次，主题包括了：结构性不平等，不平等与权利结构，不平等的生产和实作，不平等的社会伤害，不同历史文化脉络下的正义概念，正义与社会体系，超越不平等，行动者与经验，环境正义与永续未来，社会学与不平等。参与者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背景。我们希望在和在地筹备委员会的合作下，我们可以一起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开启崭新的一页。

## > Tina Uys, 国家学会副会长

我们讨论了集体会员的议题。集体会员是由国家学会或是财务与会员委员会所推荐，经由执行委员会认可。集体会员的规章必须和ISA章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符合一致。

集体会员必须是非营利组织，而且是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不论方法、理论、意识形态的差异，皆可加入。

集体会员的目标必须是增进社会学知识。其组织结构必须认可社会学的期待，并以各种方式支持社会学家自由地发展社会学知

识。

集体会员的代表负责人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

我们也决议在年度的执委会会议之间办理集体会员申请。斯洛文尼亚社会学会在2011年中申请成为集体会员，一切申请与审核都在在线完成了。乌干达社会与人类学会的申请则在会议进行期间核准。ISA现在有60个定期集体会员，但可惜的是缴交会费的情况并不踊跃。

以墨西哥2011年国家学会会议的决议为基础，地区会议补助将授予孟加拉国、保加利亚、莫桑比克、菲律宾。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也得到了网站发展补助。

国家学会委员会会议(CNA)正在计划中，将在2013年5月在土耳其首都Ankara举办。主题是：“骚动年代的社会学：比较方法”。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的社会系和土耳其社会学会，以及土耳其社会科学会共同合办。

## > Robert Van Krieken, 财务与会员副会长

我们要项各会报告的是个人会员持续在增家中，现在已经超过5000人了。终身会员会费是€300，不过我们希望依国家而调整为：Cat. A - €300, Cat. B - €200, Cat. C - €100。这要等到横滨大会才可以作成决议。我们也建议透过网可以让捐献更加方便的方式，以及研拟可以吸引

到更多捐款的方法。

我们也提供了2010和2011财务报告，希望让会员更容易了解。2010-2014的报告也会提供预算细节和来源。我们财务状况良好。我们因为活动和工作人员的增加，支出增加不少，但是这和Sage出版社的2011年的贡献相抵销了。其他额外的支出已经核准给全球对话、社会学旅程、以及编辑的旅行支出。

## > 其他

我们收到了横滨大会在地筹备会主席长谷川公一鼓舞人心的报告。于是和我们在UN的代表(Jan Fritz, Rudolf Richter, Rosemary Barberet, and Hilde Jakobse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ociology of Law (Ramon Flecha)以及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Emma Porio)一起讨论了这份报告。伊庆春也告诉了我们2012年台北Laboratory for PhD Students的进度。此外，我们也署名写了一份也署名写了一份信件给欧盟，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最后要谢谢合办的单位，为我们在Beirut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感谢在AUB的Sari Hanafi、Oubada Kassar、和Chebib Diab。此外也谢谢在场的工作人员以及ISA的秘书处，使得会议圆满成功！

# > 知识交流， 探索南非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 ISA国家副会长



ISA PhD Laboratory到南非Soweto

**博**士班实验室第10届会议在2011年11月8-11日于南非举行。地点是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Island, 它位于靠近Vereeniging的Vaal Dam。一行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 像是中国、伊朗、欧洲、美国、墨西哥、巴西, 他们从50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同行参加的还有两位南非的学生。同行的老师也很多元, 包括了来自美国的Jan Marie Fritz, 台湾的伊庆春, 和日本的左藤嘉伦。今年主题是社会排除、公民身份、社会资本。

活动由一项“欢迎学生回到非洲”的

节目展开。首先是拜访Sterkfontein洞窟, 它是世界遗迹, 科学家在此找到很多人类祖先和其他动物的化石。这在400万年前, 人类那时刚刚才诞生。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化石是“Mrs Ples”, 它是一个210万年前的Australopithecus头颅; 另外一个“Little Foot”, 一副300多万年、几近完整的Australopithecus骨架。这趟历史巡礼结束后, 师生们就搭巴士和船到了岛上。

这次活动有4天, 学生和教授都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讨论非常热烈, 来自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也让会议更加有意义。在这夏季所举办的活动也包括了一些游戏, 以及乘船环绕岛屿, 让大家更能认识彼此。最后的压轴是南非传统的braai (barbecue)和营火。星期六的时候, 透过在Soweto的传统的shebeen午餐, 师生们了解了南非的历史文化。离别晚宴在当晚的The View Hotel举行, 让大家对Johannesburg的Melville Koppies Nature Reserve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 我要谢谢人文学院院长Rory Ryan教授, 提供了此次活动的金钱援助。我相信博士班实验室的成员在Johannesburg拥有了美好愉快的回忆。■

# > 社会学之旅

by Laleh Behbehan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Laleh Behbehanian负责ISA“社会学之旅”(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这个计划案。全球对话希望她来谈谈她从这访谈执行委员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

**社**会学之旅是一系列对ISA执行委员的访谈。透过Skype, 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机会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些社会学家学习社会学的私人趣事和心路历程。访谈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她们怎么会对社会学感到兴趣的; 第二个是他/她们所面对到的挑战为何。所有的访谈都可以在ISA的网站上看到: <http://www.isa-sociology.org/journeys-through-sociology/>

虽然访谈之中充满了各式各样丰富的故事, 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些经验是大家都共享的。最基本的是他们都表露出了对这个社会世界无比的好奇心。因此, 当左藤嘉伦谈到如何接触社会学时, 他说是为了理解“社会谜题”而开始的; 而Jennifer Platt则描述了处

理各种数据时的雀跃与兴奋。对于多数学者而言, 他们对社会学的好奇通常来自于迁徙和旅行的经验。Michael Burawoy的社会学想象被到美国、印度、赞比亚的旅行经验所驱使。Habibul Khondker的从巴格达到加拿大、新加坡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迁徙经验深深影响了他将自己定位成从事比较研究的巡回社会学家。Tom Dwyer提到了早年生长在一个纽西兰的爱尔兰移民家庭, 年轻时到处去旅行, 这样的“陌生人”经验形塑了他的社会学想象。Vineeta Sinha也提到了类似的概念, 当她的社会学老师带给了她某种社会学知识的“不安”时, 她其实是很兴奋地运用新的框架去诠释这个世界。

许多学者当初都是被他们的老师所启发的。这或许并不意外。他们也想将

这样的启发带给他们现在的学生。Tina Uys就叙述到她的老师当初所带给她的深刻印样, 并且如和运用社会学去理解和处理现在南非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也是来自南非Simon Mapadimengwas当初被一位实际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老师所启蒙, 并且让他立定志向要教育好下一代的黑人学生。

此外, 有个主题重复不断地出现在访谈中, 那就是社会学知识作为改变社会的一种媒介, 并且社会学用来处理政治、经济问题的潜力。Jaime Jiménez回忆到在1958年时, 当时他还是学生, 并在使用墨西哥的第一部计算机时让他下定决心要使用量化方法去做研究, 并解决墨西哥的社会问题。Dilek Cindoglu则是被1970年土耳其的政治动荡唤起了社会学的兴趣。他说: “我

当时想要知道土耳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初衷至今依旧不变！”

而许多的访谈都提到了个人生命和历史的交会如何激发了社会学的兴趣。Ishwar Modi说到了印度独立时期社会科学家如何投身国家的重建和发展。伊庆春是被1970年代台湾的巨变所激发兴趣。而Emma Porio则是出自想要理解菲律宾戒严时期的快速社会变迁。Elena Zdravomyslova 则讲述了她父亲和她父亲的同事在建立苏维埃社会学时的故事如何影响了她，以及在1970年代如何对社会学幻灭，还有在共产瓦解之后社会学的复苏。

访谈的另一个主题是学者所面临的挑战。有些挑战和困难来自于性别、族群、民族的差异。许多全球南方的社会学家都谈论到了他们百般努力想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疆界，以及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全球不平等现象(语言、出版机会、研究喜好等)。很多学者也都积

极地从事地方扎根和放眼全球的研究。Sari Hanafi很巧妙地说明了南方学者的困境：“publishing globally and perishing locally”和“publishing locally and perishing locally”。

其他还有很多挑战是这些学者都同时面临到的，其中包括了学科界线的问题。Raquel Sosa说她很努力地要在拉美发展科际整合研究，试图找出新的社会解释框架。Robert van Krieken认为社会学可以在科际整合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其他也有蛮多人提到社会学家多重身份之间的平衡(教学、研究、行政、运动等)。以及在社会学研究的不同要素间的协商问题(专业、批判、政策、公共)。Margaret Abraham透过对于美国南亚社群的家庭暴力研究和社运经验去探讨这个挑战。

访谈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学对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意义和影响。他们也都谈到了身为ISA执委的趣事。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

什么，请到每个访谈最后，看看当他们被问到若不当社会学家而要做什么的这个时，注意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当律师、医生、记者、建筑师，甚至是跳肚皮舞、芭蕾舞、开吧台、木匠，或是主持名为“stirring it up”烹饪节目。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有这些有趣又有人性的学者来担任ISA的执委。 ■

# > 阿拉伯抗争

## 社会学观点和比较

by Amina Arabi和Julian Jürgenmey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黎巴嫩



在Mohamed Mahmoud Street上的革命艺术，Cairo。Mona Abaza.摄影。

**阿**拉伯世界的群众抗议仍前途未卜。不过有一点很清楚的是，自从殖民结束和阿拉伯例外主义以来，这里的政治地景变得更难预测。2012年3月20-21日，在Beirut的American University举行了一场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阿拉伯世界、北美、南美、印度、欧洲的学

者，齐聚一堂讨论最近的社会抗议风潮。会议里面特别聚焦在那些往往被忽略的观点，并且试图透过比较与历史的方法去发展出新的解释框架。

会议中，Marku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报告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从比较的视野去拓深社会运动

的理论架构。阿拉伯社运和占领华尔街之间的平行相似性其实相当明显，像是论述、去中心化等特质。阿拉伯革命的个案中，Mohammed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就追溯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他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表现，一种对威权的怀疑，进

>>

而奋力争取民主。

对民主的渴求到底在这些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问题其实一直争辩不休。即使参加抗议的人都同意是因为经济因素而走上街头，但是他们却都反对过度化约的唯物论解释和不恰当的阿拉伯社会转型理论架构。Abdulhadi Khalaf (Lund University)则以巴林的个案来说明这是一个绝对的政治反抗运动——反对国王的统治、愚民政策(bread and circuses)以及要求公民权利，拒绝只是当臣民。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在抗议中看到了新的政治主体的浮现，和新自由主义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他们提出了集体的解放计划，诉求积极改变社会关系，甚至改变整个集体。用Hanafi的话来说：

“反身的自由主义”可以超越派系和道德分裂，然后迈向新的爱国主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突尼西亚或是埃及，后革命的投票行为还是被族群和宗派忠诚所决定。

Raquel Sosa Elízaga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和Edgardo Lander (Venezuelan Central University, Caracas)从拉美的经验呼吁更彻底的社会革命，而非政体转型而已。唯有如此才可能克服剥削和压迫的结构。这种结构性压迫，在拉美就是“协商转型”都后果。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也以南非的协商转型为例子说明这种历史过程

的保守性格。

以拉美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军队或武装势力是转型中的重要行动者。Yezid Sayigh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Beirut)指出在阿拉伯世界亦是如此，若是武装势力在威权时期就是关键的行动者，那么结果便是武装的势力会在转型之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如此一来，民兵部队之间的关系与组成就是后革命时期这些政府所要面临的重要议题。武装份子通常是社会长期建立过程的干扰者，所以Sayigh认为可能非常难以去约束社会中的军队势力。此外，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也讨论公共领域中革命势力与军队势力的分裂。她在她的文章“后革命时期的省思”中就指出埃及的军队仍然不受民主体制所掌控，且仍企图想要掌握大权。

土耳其的军民关系仍常常被用来作为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典型案例。Dilek Cindoğlu (Bilkent University, Ankara)对此提出质疑。他指出了土耳其民主的一些缺点，并提醒“性别盲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危险。Fatima Kubaissi (Qatar University)和Jan Marie Fritz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美国)则进一步阐释女性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性，Fritz强调政治变迁的机遇性开启了社会转型和女性培力的政治机会。

至于要培力什么人才可以巩固民主呢？Justin Gen-

gler (Qatar University)认为传统的一些价值可以被转译进而支持民主价值。以World Values Survey为基础，Gengler提出了一个争议性的假设：公民社会不是一个民主化的管道，反而有利于侍从体制的巩固。

Göran Therbor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延伸了Gengler的论点，认为即使在民主国家，公民社会通常是群众利益的集合，而非民主价值的展现场域。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谢谢Hanafi的灵机一动，促成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比较民主化而言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有少数的参与者特别锁定在阿拉伯经验本身，讨论很细节的经验案例。所以，一个比较普遍的比较框架是可以发展的。我们必须记住阿拉伯革命的自发性不可能被任何决定性的框架来解释，反而是要如Göran Therborn所言，以人类行动的不可预期性来理解。因此，Nahla Chahal (al-Safeer newspaper)在她的演讲中提醒我们，研究政治的学者必须抓住这次历史时刻，并将理论转化成革命的实践。■

# > 社会学是单数或是复数？

## 波兰观点

by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波兰



在Warsaw讨论社会学的未来。

**全**球对话2.2期对于不平等的辩论相当精采，而这也正好是波兰出版的第一份全球对话。我们以学生为主的Public Sociology Lab编辑团队决定要把辩论从全球的层次拉到地方，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研讨会，讨论由Piotr Sztompka和他的反对者所提出的问题，并从波兰的角度切入。

这个研讨会在2012年1月19日举行，吸引了来自本大

学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博士候选人、教授等前来参加。每一位与会者都可以自在的发表意见，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位演讲者。Anna Giza-Poleszczuk教授是著名的家庭社会学与社会关系学家，并活跃于波兰的NGO。Antoni Sulek教授是前波兰社会学学会(PTS)的会长，专长是方法论，公共意见，以及波兰社会学史。Izabela Wagner博士的领域是科学家和音乐家的专业生涯，她在法国、波兰

、美国等地进行研究，并在Paris的EHESS和Harvard University等地的学者有合作。

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社会学内部的争议到波兰于2011年实施的政治与教育改革等议题。不过主要我们还是在讨论复数社会学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若都同意在地或地方的社会学对于处理在地的议题是有必要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至关重要。所以，核心待解的问题是：社

>>

社会学是单数还是复数？

Wagner博士借着指出社会学家之间的分野和不平等来开启整个讨论。冲突不只存在于北方和南方、西方和东方、菁英和非菁英的社会学家之间而已，冲突还存在于理论家和民族志学者之间。对Izabela Wagner来说，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的相反看法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生涯和社会背景。她用分子生物学为例来解释。她说，分子生物学向来是实验室导向的科学，利用in vitro方法去找出科学的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人造的假结果，所以in vivo方法就取而代之。虽然这个方法很耗费资源，而且将近95%的几率会失败，不过若成功的话，结果则相当可信，因为是建立在真实经验的实验上。in vitro方法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理论研究，而in vivo则像是民族志研究，从田野中得到理论。Wagner博士希望社会学可以像生物学那样转向in vivo方法。

Antoni Sulek教授提出了另外一种定义社会学的取径，认为社会学是“论述社会的科学”，不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因此，我们可以讨论论述社会的语言的多元性，就像我们也可以讨论社会的多样性一样。后者可能是个无解的谜题(不同的社会到底有多么不同)。反之，若我们考虑到我们所使用的社会学语言，就会发现普遍和个别之间的对立就是虚假的。Sulek提出社会学有两种理路。第一种是社会学家之间的沟通。如此，英语发表不但可接受的，还是可欲的。就是“社会学家面向世界，然后用世界的语言与世界沟通。”这个目的是用理论的语言去讨论经验现象，所以脉络在此并非重点。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理路，就是

社会学家和社会对话。这就是社会学的关键所在。Sulek教授说这个理路的最佳方就是社会学式的写作，使用大众的语言而非学术语汇。要注意的是，这不能和名嘴社会学家搞混，因为后者比较像是明星，而非学者。

Anna Giza-Poleszczuk教授也提出了另类的社会学版本。她说在寻找普遍社会学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下列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去发表他或她的普遍理论吗？我们认为机制可以保护社会学被少数人独占吗？第二，谁设定了社会学的研究议程？谁决定了什么是这个领域的重要问题？第三，大家真的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吗？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只是表现在社会逻辑的再现而已，理论也决定了我们如何观看这个世界的确，有些理论的确不太好，就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套用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国家。

Giza-Poleszczuk还提到了最近波兰在公共社会学的架构下的教育改革<sup>2</sup>。Maciej Gdula是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的指导教授。他认为改革大大地影响了波兰的学术环境。后果就是让波兰学术界变得更像美国，因为采用SCI作为学术评鉴的指标，而非去考虑出版的文章是否真的对波兰社会有意义。公共社会学并不是要去得到国际的认可，而是要在当地社会建立起脉络性的连带。

学术依赖性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框架去分析波兰的学术体制。可是这个会议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因为就如Jeffrey C. Alexander在全球对话2.3所说的，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争议不可能一了百了，不过可以定期地更新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

共识，像是Sulek就在会议尾声时强调：真正重要的是从事“好的社会学”。我们都有自由去设定各自的好坏标准，而接下来要做的是就是去实践这个标准。

在此，我们的结论非常重要：社会学不必削足适履，一心一意想成为所谓“好的科学”；但是，若我们认同公共社会学的理念，甚至认同解释地方问题而发展地方社会学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发展出判断标准，以科学的角度去评断研究的良窳。■

## 批注：

1. Koło Naukowe Socjologii Publicznej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由University of Warsaw的社会学研究所学生所组成。若要联络我们，请至：[public.sociology.kn@uw.edu.pl](mailto:public.sociology.kn@uw.edu.pl) 或是到<http://www.facebook.com/socjologiapubliczna>

2. 更多关于波兰教育改革的文章，可前往Izabela Wagner和Anna Szolucha的ISA blog (<http://www.isa-sociology.org/universities-in-crisis/>)

# > 青春与活力：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by Reyhaneh Javadi, University of Tehran, 伊朗

**当**我们在翻译上一期的日本团队介绍时，当看到他/她们的学历和研究领域心里不禁这么惊呼：“天啊！他们全都是教授和博士生，而我们只是一群小孩子！”

没错，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群非常年轻的社会学家。由于我们认为需要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們自己在University of Tehran组织了社会学学生会。我们想要挑战现有的教育系统，希望改善它。我们的核心会员是由学生成员所选出，任期为1年。

就在我们的组织停止运作几年之后，去年又恢复了。我们的核心成员包括了Saghar Bozorgi, Najmeh Taheri, Elahe Noor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zade, Somaieh Rostampour, 和Reyhaneh Javadi。现在的团对在一个月前开始工作。有些新面孔是刚毕业的学生：Nastaran Mahmoudza-

deh, Tara Asgari Laleh, and Zahra Babaei。除了2位研究生，其他都是本科生。还有，我们都是女性！

我们的团对首要工作是组织读书会，研读社会学经典作品。此外也举办工作坊，像是伊朗宗教社会学。也举行摄影展，演讲，邀请到Michael Burawoy (Public Sociology)和Jennifer Platt (History of Sociology)。最后我们还发行了一份学生刊物Sareh (Pure)，每一期包含两个部分。第一是社会学教学的批判性反省。第二是翻译社会学家的作品。

翻译全球对话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和其他团队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共同选出翻译者。这大大的激发了我们的学术热忱。所以每一期我们由教授跟大家宣布，征求有兴趣的译者缴交一份试译稿。每一期我们选出最好的4名译者。以下是我们译者群的简介。



Reyhaneh Javadi: University of Tehran (UT) 社会学研究生，从UT社会系毕业。她的研究领域是19和20世纪的伊朗历史社会学。



Jalal Karimian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SBU) 哲学系研究生。他从UT拿到社会科学学士。现在研究存在主义和宗教现象学，同时对公共社会学也很感兴趣。



Shahrads Shahvand: UT国际关系研究生，毕业于Persian Gulf University (PGU) 化工系。他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政治，特别是南亚和巴基斯坦。



Saghar Bozorgi: UT社会学系本科生。她的研究兴趣是历史社会学和现代伊朗。

>>



Najmeh Taheri: UT社会系本科生。



Tara Asgari Laleh: UT社会系本科生。



Fatemeh Moghaddasi: Al-lameh Tabataba' i University (ATU)的社会学研究生，毕业于UT社会系。他的主要兴趣是教育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着重在伊朗的公共社会学历史和公共社会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拓展。



Zeinab Nesar: UT社会学研究生。她毕业于UT，兴趣为性别研究。



Faezeh Esmaili: UT社会学研究生，毕业于SBU。她的兴趣是Pahlavi时代的社会政策。



Mitra Daneshvar: UT社会学本科生。她正在研究青少年偏差，特别是伊朗的死刑。

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加入全球对话的行列! ■

## > 法语社会学

by André Petitat, University of Lausanne, 瑞士, AISLF



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 - 生于苏联的法国知识分子与教授，也曾经带领过AISLF。

**第**19届的全球法语社会学会(AISLF)大会将在2012年7月2-7日于Rabat举行。AISLF是ISA的会员，创立于1958年。当时是一个美国军事、经济、科技、

科学的霸权年代。显然地，那个时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跟随美国功能论和统计实征的步伐从事研究。相较之下，欧陆的方法更能敏锐地关照到社会的冲突与转变。像是相当有名的学者Georges Gurvitch就延续Sorokin对于美国 testomania 和 quantophrenia的批评，发展出其对美国方法论的批判。

>>

虽然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在1954年就结束了，但是却对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实质的影响。

由于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和美国大相径庭，加上英语霸权，促使了AISLF的成立。因此，AISLF本身即是科学的政治行动，亦是语言的政治行动，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多元，以及语言多样性，并藉由结合两者达成此一目标。

长期下来AISLF成长为拥有1800多名会员，由50多个国家所组成的学术性组织。AISLF不是一个地域或是国家的集合，而是文化语言的空间，由许多的国家、区域教育机构、研究中心等全法语或部分法语的单位所组成。有些人甚至是喜好法语社会学但却在非法语系国家中被孤立的学者。这样的一个“区域语言”学术组织拥有超过50个的主题小组，并有一份在线期刊：SociologieS；此外，透过Rédoc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Doctoral Schools) 我们提供年轻学术人员的训练，每年定期举办暑期课程。AISLF的活动会定期记录在Lettre de l' AISLF。欲了解更多的

细节可前往[aislf.org](http://aislf.org)。

AISLF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辩论空间。辩论包括了法语社会学中的各种“学派”之间的争议，在这之中AISLF并不会预设特定的立场。如此一来，AISLF是在实践其创立的目标：维护社会学的多元，并鼓励组织内的辩论风气。这项目标始终如一。AISLF作为一个文化语言的组织，让那些在国家层次上所创生的概念，得以超越原本过于限缩的发展空间，并得到机会可以发芽茁壮。社会学若是要能蓬勃发展，那么就必须有这么样的组织去支撑起一个语言近似性的空间。而ISA的一项任务也是去促进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对话，会长Michael Burawoy也正是当今此一任务的推动者。

我们都很清楚语言空间是不平等且阶层化的。而英语位居于最上层阶级。多重因素导致了这个霸权的产生，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每一个语言空间的内部也有其自身的不平等和阶层结构。以法语作为阅读与写作的媒介这件事情，对于赛内加尔和摩洛哥，以及对于法国和加拿大魁北克来说，意义是

大不相同的。在法语内部地确也有不平等的阶层化问题。

当初AISLF所成立的背景脉络已经是成为历史了。现在美国的社会学比以往已经变得更加多元。美国外销最成功的两项理论产品：理性选择论和符号互动论，如今已经成为法语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这个结果或许和社会学的次领域分化多少也有些关系。

二元对立的世界(1950-1970)已经衍变成多中心的世界了。我们现在是身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拥有许多新的文化独立单位，人们、商品、信息之间也充满较多的流动性。这个世界过多的信息与科技，或许早已被社会学的创立者预料到了。自由放任的计划和笛卡尔的科技梦想(自然的主人与国王)带来了经济与生态的不确定性，人类也要求更多对于危机的管制，以免在这矛盾巨浪中灭顶。AISLF的19届大会主题是“不确定性”，我们希望藉此希望可以为当前人类社会的困境找到新的生机。 ■

# > 历史一隅：

## 更多关于AISLF的历史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出版副会长

这里对于André Petitat的文章作点历史背景的补充，着重在AISLF和ISA的关系上。这两者其实曾经有过内部的冲突。1949年ISA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而其总部长年设在巴黎。虽然随着美国在战后跃居于宰制地位，法语日渐式微，可是在此之前，法语总是拥有形式和实质上的重要性，且是外交的主要语言。之前ISA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排除了其他有着早期社会学历史的语言，因为，在大战时期，这些语言站在法西斯主义那边。当ISA越来越独立于UNESCO之后，法语就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也因此Georges Gurvitch在当时提出了设立ISA法语分会的构想。但是由于这违背国际主义的精神，所以被否决了。1958年则诞生了独立的AISLF由Gurvitch和比利时社会学家Henri Janne所创。不过在1963年时其加入了ISA成为集体会员。或许这也促成了AISLF的执行委员Girod成为了后来ISA的秘书！

ISA的定期活动通常都是由国家会员为主要贡献者。但若考虑语言而非考虑地区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诚如Petitat所言，法国并非是ISA中唯一的法语贡献者，其他像是比利时、加拿大、瑞士等也都有着重

要的地位。从1949到1956年，ISA的会长皆为美国籍，而只有其中一任的副会长是法国籍的Georges Davy。不过1956-1959年的会长是法籍的Georges Friedmann。之后则有着很大的断层，直到了2006-2009年的Michel Wieviorka才又有法籍会长。不过这几年之间都仍然维持者有一位法籍执行委员的情况，而且11任副会长中就有7任是法国人。

有3次世界大会举办在法语国家(大多是双语国家)：1953年在Liège，1966年在Evian，1998年在Montréal。而在总部设于Madrid之前，有3任秘书处社于法语国家(1959-62在Louvain，1962-7在Genève，1974-82在Montréal)。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著名的会员像是Anouar Abdel-Malek,虽然不是法国人，但是却在巴黎工作过，或是和法国的有很深的渊源。同样地，像是法语的移民如Jacques Dofny从比利时移民到魁北克，则建立了重要的连带。由此可见语言如何建立了社会连带，也体现了不同的身份认同。■

# > 印度社会学 面临的挑战

by Ishwar Modi, 印度社会学会长, ISA执委



Ishwar Modi点燃蜡烛(ISS在Jaipur召开的年度会议)。

纪印度社会学的座右铭。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印度要向巴西、俄罗斯、中国、南非等国学习。东欧后社会主义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印度还要向东方、中东、非洲的本土智识传统吸取长处，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社会学。换言之，印度不仅要保留西方社会学的优点，还要从发展国家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我们也要连结主流印度社会学和印度的地方社会文化。这个目的的达成有赖于我们和地方性的文化组织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总之，我有信心ISS可以实现这三个愿景！ ■

## Reference

Modi, I. (2010) "Indian Sociology Faces the World." Pp.316-325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印度社会学不论是教学或是研究，水平都相当高。能有今日的成就，印度社会学会(ISS)在过去60年功不可没。而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从2012年开始担任为期2年的会长职务。ISS目前拥有3500名印度或是外国的终身会员。然而，印度的社会学目前正站在十次路口上，这间百年老店面临着许多挑战。过去的殖民历史幽灵仍然徘徊在我们的教育与方法里面，美国的学术霸权也笼罩在我们的上空，影响概念、方法、与理论的建构。印度社会学仍未能在理论和概念发展上获得成功 (Modi, 2010)。

若我们要同情性的理解各种复杂的议题，则理性的本土化需要成为实体。我们有

必要去发展一个切身相关的社会学(relevant sociology)。在我的会长任内，我会去尝试让大家讨论如何去拓广印度社会学的眼界，而同时也不能和世界的潮流脱轨。ISS的发声管道是Sociological Bulletin这份期刊。我们会增加发行期数，拓展主题，多语化，并最后让它成为国际级的刊物。此外还要制作特刊，资深的社会学家可以为其撰文。还有，我们会进行电子化。

除了Sociological Bulletin的更新之外，我们还要开启需多新的辩论议题，像是发展、政治的社会基础、文化认同的新面向，中产阶级的扩张，社会不平等，城乡差距等等。民主的社会学(People's Sociology)将会是21世

# > Ankara大学的公共社会学

by Günnur Ertong和Yonca Odabaş, Ankara University, 土耳其



工人聚集在帐篷内抗议TEKEL的新政策。

**我**们是一群在Ankara University社会系和Aytül Kasapoğlu教授共事的社会学研究生、博士后、和教授。

这个群体成员的更动相当频繁，人们加入一起学习并分享经验与知识，主要都是Kasapoğlu教授的指导学生。即使学生毕业或出去工作了，这个研究学习的网络始终把每个人连结在一起。以下我会简介我们共同出版和Kasapoğlu教授讨论课的经验，以及一份我们常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

我们所要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是Aytül Kasapoğlu教授上课的内容汇整，主要以学生和老师的研究为主，并结合理论与实践。第一册叫做Character in a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探讨社会结构下个人特质的消蚀。第二本是New Social Traumas检视社会创伤的叙事。第三本是Social Life and Conflict: Different Panoramas处理社会生活与冲突等议题。最后一册是Two Sides of the Coin: Health and Illness，讨论公共健康议题。Kasapoğlu教授所的讨论课会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文献，刺激新的想法。毕业的学生还是会回来上讨论课并发言，启发的许多新面孔。

我们最近完成的一项田野研究是关于2009年12月的TEKEL罢工。TEKEL 一间很大的烟酒国营企业。罢工则在Ankara (土耳其首都)持续了78天。罢工起因于工人阶层位置的改变。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导致人事开销增加，使得公司开始雇用临时工，使得有保障的工人迅速减

少。

工人很抗拒这波“弹性化”政策，从2009年12月14日开始罢工，而警方也采用镇压手段。由于天气寒冷和政府迟迟不回应，TEKEL工人开始在街上扎营抗争。这些帐篷引来了大量民众的注意。尽管政府的态度强硬，工人还是受到来自各方，例如科学家、艺术家、或学生的广泛支持。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前往支持，并从事研究，并在罢工现场运用Herbert Blumer的群众动员理论去协助TEKEL工人。这项研究我们发表在2009年9月的欧洲社会学年会上(ESA)

Yurt ve Dünya - 家乡和世界 - 是一份从2010年开始发行的在线刊物([www.yurtvedunya.net](http://www.yurtvedunya.net))。不过它的历史可长了。Yurt ve Dünya 在1941年就发行了第一期。我们后来受到了Michael 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运动所启发，决定重新出版Yurt ve Dünya，希望可以激起师生的研究能量。主要目标是跟公众分享社会学研究的知识，而首要的公众对象就是土耳其各大学的社会系学生。

我们正在计划把这样的公共社会学延伸到国际场域。而且我们都是ISA和ASA的会员。因为我们也知道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学术合作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积极参与在国内的组织。■

我们很高兴可以发展出这么一个协力研究的文化和公共社会学。若任何任对我们的团队感到兴趣，请联系：

Aytül Kasapoğlu: [lukasap@humanity.ankara.edu.tr](mailto:lukasap@humanity.ankara.edu.tr)

Yonca Odabaş: [yoncaodabas@yahoo.com](mailto:yoncaodabas@yahoo.com)

Günnur Ertong: [gertong07@gmail.com](mailto:gertong07@gmail.com)

# > 民主化未来： 寻找平等和参与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美国, ISA横滨世界大会计划委员



Plaza de Mayo的母亲们，Buenos。  
Markus Schulz摄影。

ISA的未来研究委员会(Futures Research; RC07)将在Buenos Aires召开的论坛中聚首，并以“民主化未来”为主题。这个主题和论坛的主旨“社会正义和民主化”相呼应。这个题目有双重意义：若是以形容词的方式来理解，那“民主化”代表了未来会带来更多的民主

；若以动词的方式来理解，那“民主化”意味着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因此民主化未来其实是我们对于正义和参与的求索。我们有意地将未来加上s(futures)，强调那是复数。如许多后殖民学者，像是Arturo Escobar, Aníbal Quijano, Walter D. Mignolo，和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宣称的，我们需要复数的知识论。尽管他们的主张很细心且吸引人，可是单一线性的模式已经不能描述人类的历史。横断的概念似乎更能妥善解释混乱且争议性的社会真实。民主化未来在这个意义下即是在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观之间进行对话。

>>



在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为前提下，未来似乎就近在咫尺，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世界的秩序与走向。挑战则遍地开花，从Chiapas丛林到Seattle, Prague, Genoa 或是Davos等城市都见得到。全球的权力菁英关起门来开他们的高峰会。恐惧政治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名席卷各地，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帝国的扩张，直到了金融危机发声，媒体才开始赶潮流谈论资本主义的尽头。这些新闻标题并不成熟，而且数十亿的银行纾困案一夜之间就被敲定，不过，这也显示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多么岌岌可危。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国力日益下滑，并还要面对中国等其他国家崛起，南美国家如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等找到了新的方式去拒绝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的条件措施，发展自己的道路。阿拉伯世界风起云涌的抗争浪潮赶走了万年暴君，开启了该地区民主化的新扉页，甚至对美国造成了影响。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从一

开始的小抗争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被一些大企业媒体嘲笑缺乏明确的诉求，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型态才使得它那么受到广泛回响。最重要的是占领纽约的Liberty Square，就像占领其他的广场一样，用意在于开启对话的空间。并且将“半公共”且由大企业所拥有的Zuccotti Park 转变为拥有艺术、音乐、共享食物、图书馆、辩论等的公共领域。辩论不仅关乎1%的人利益，更是和其他99%的人息息相关。就像那些自制的标语所言，这个运动的诉求其实很明确，从公平经济到环保，从税制到选举经费改革。运动的轴线就是要求还政于民。运动也挑战不平等和企业过度干政的现象。警察虽然成功地压制了许多成是的占领运动，不过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中获取了经验，将对民主化未来带来深远影响。

社会学可以从这个运动学习到未来的可塑性。RC07在 Buenos Aires的论坛中将会触及几个问题：

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未来？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什么决定了我们想象的视野？在全球化时代里如何重新思考民主？如何以永续的思维去解决气候变迁、环境恶化、饥饿、暴力等问题？如何民主化公共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媒体、和科技。食物、风险、机会的分配怎么才可以更平等？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学到些什么？解放运动如何实践以对抗管制、剥削、和象征暴力？什么样的未来是所欲、可求、可及的？社会要怎么转型？未来研究如何和更广泛的公共辩论产生关连？

我们很谢谢Alberto Bialakowsky、Alicia Palermo、Margaret Abraham、Michael Burawoy、和Raquel Sosa，没有他/她们，论坛不可能成功。让我们期待在Buenos Aires的世界论坛！ ■